

# 《抒情与描写》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抒情与描写》

13位ISBN编号：9787542622624

10位ISBN编号：7542622625

出版时间：2006年6月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孙康宜

页数：234

译者：钟振振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抒情与描写》

## 内容概要

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是由极其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在传统与个人独创的互动和互补之间，文学才逐渐显示出它的多样化。本书中作者在分析六朝诗歌之时，选择了“表现”和“描写”这两个文学因素，来作为检验个别诗人风格的参照点，主要因为在80年代初期的美国文学批评界中，“描写”正是许多批评家所探讨的重点。在逐渐走向后现代的趋势中，人们开始对视觉经验的诸多含义产生了格外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也就直接促成了文学研究者对“描写”的兴趣。传统与个人创造的相互作用是本书关注的中心，书中所论及的五位诗人，在发展自己的个人风格时，都寻求将自己的抒情与过去的典范联系在一起。

# 《抒情与描写》

## 作者简介

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1944年生于北京，1946年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年移居美国。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文学教授，并为该系两任系主任。曾获美国人文学科的多项荣誉奖金，著有多种英文学术专著和中文著作。200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邀请，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共同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此研究项目预计于2008年完成。

# 《抒情与描写》

## 精彩短评

- 1、按孙康宜自己的说法，本书英文原作的两大关键词分别是“表现”（expression）和“描写”（description），内中暗含的西方理论框架自是不言自明。而钟振振教授将expression替换为“抒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若深究lyric和expression的关系，则会牵连出“抒情传统”研究中最据迷惑性的“浪漫主义”，而孙康宜与高友工的师生之谊，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叙述框架。
  - 2、因为是“概论”、不细读了，反而比陈柳和宋词两本要好……译者偷懒没翻译参考书目？
  - 3、孙康宜这本书写得好，钟振振也译得好，所阐述的问题更值得当代诗人们思考和借鉴。汉学中的灰姑娘。大概是因为六朝诗歌较少人去注意，事实上像这样一本书应更受注意才对。
  - 4、题目倒是说到点子上了。
  - 5、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篇真的很出彩；陶渊明篇相比下，略显平淡。也许是因为关于陶的研究已经太多，很难再有新意了。
  - 6、无需多言
  - 7、这书不错。
  - 8、像这样能给人愉快阅读体验的学术著作不多。
  - 9、孙康宜之博士论文，主要围绕抒情与描写两大传统，其发展及融合立论。
  - 10、作品和人融合在一起
  - 11、论陶渊明作为诗歌NPC之妙用
  - 12、六朝！六朝！
  - 13、满篇都是华丽而夸张的叙述，充满了误读和牵强附会，似乎要把一段中国文学史硬塞进一个用现代西方理论构建起来的俗套之中。
  - 14、孙康宜的这一本六朝诗研究，对于通过女性研究了解她的我来说，足以用“惊艳”二字形容。最精妙的当是关于谢灵运及谢朓的章节。“巧构形似之言”的流行技法，在康乐公手里神工默运，以思力为之，然而千载之下，读者如我，只能将初发芙蓉，识为雕绩满眼。孙氏的逻辑分解对于抉发谢客山水诗绘画性与精准性相当适用，亦於提显小谢的八句诗体、抒情结构之于唐律的先声作用颇有力。另有陶潜、鲍照诸人，在抒情与描写的二维关照下凸显出个体精神与时代风潮最佳结合，从而特异饱满。
  - 15、读解细腻，叙述明晰，能在86年出版这样的书，还是很了不起的。
  - 16、孙康宜老师不错啊
  - 17、好玩儿 不过后面看的有点粗
  - 18、尽管涉及到的作家不多，仅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与庾信五人，但无论是文学史的眼光，还是细读的功力，读下来，着实钦佩。
  - 19、已经出版二十多年了诶……里面比较喜欢的是陶渊明和庾信那两章
  - 20、附录论陶渊明至多算研究资料汇编。
  - 21、发现海外汉学家的研究通常不会局限在某一个人或是具体的事件上，而是将一套理论或是一个观点贯穿进连续或是随机的序列中，以此来寻找意义，这样做也许会有主观之嫌，但自己却一定不会觉得 meaningless了：）
- 还有一点，他们会发现文学史的死角，形成自己的文学观，恩：）

1、前不久，一个叫施罗德·斯蒂文的美国诗人来云大演讲，此人虽然已经到了头发眉毛一把抓的年纪，但依旧顽皮可爱。朗诵起诗歌来张牙舞爪，声情并茂，让人联想起那些欧洲中世纪走街串巷，游荡在村镇之间的游吟诗人。他认为诗歌是一种“表演”，是在“出风头”——一个诗人在写诗或朗诵诗歌时应该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最好的那面展现给别人看。这种观点透着美国文化里直接、爽朗的气质，但也有着些美国式的虚荣——爱出风头，逞英雄。正好最近在读孙康宜先生这本关于六朝诗歌的书，里面写陶渊明的一章非常精彩，她的两个观点，即陶渊明诗歌对当时盛行的玄学诗与唯美派诗歌的自然疏离，恢复了中国诗抒情的传统；以及陶渊明诗歌里浓厚的“自传”文本模式，我都深为赞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诗人，比如曹操、阮籍等，他们的诗朴实、自然，不求修饰，直抒胸臆，不拘泥于刻板的韵脚与形式套路，这样的诗我都非常喜欢，而陶渊明又是其中我最为喜爱的中国诗人，不但由于他的诗虽然由一种朴素、平淡的语言但却获得了极其开阔与丰富的内在韵味，更由于他诗歌中深刻、真挚的自我审视与自我认知的品质。孙先生认为陶渊明在他的诗歌中创造了一种自传体的模式，通过一种形象，对自己作出自我界定（界定一词用的极好），并在不断虚构这一文本形象的过程中，界说了自己在生命中的“自我认知”这一终极目的。这话说的极好，写诗本来就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所谓我手写我口，只要在写诗的过程中，释放掉了内心里那种遏制不住的冲动，其它的事又何必去考虑呢？——当然了，写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但本质上也是一回事，一个心怀旁鹜的人写出的作品永远只能是二流）。读诗也差不多，我还是认为，读别人的诗，和让别人读自己的诗都源自一种交流的渴望，这种交流不是因为社交目的，不是祥林嫂式的博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同情，更不是为了显摆自己和获利，它有时甚至是对死人说话，是自己对自己虚构出的另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我对在诗歌中“SHOW”自己，大段炫技式的“SOLO”都无恶意。技艺高超的表演者可以带给观众身心愉悦，给予他们掌声当然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只是我不太认同将“表演”当成是诗歌的源头，当成是激发诗歌快感的源动力。诗歌毕竟不是竞技体育，更不是华山论剑。况且，要满足虚荣心，在当今社会最好是从事娱乐业，成为歌星和影星或交际花，这样貌似更立竿见影些。

2、研究唐诗的大家程千帆先生要求他的研究生英语一定要好，最初这的确有些令人费解。不过其中原由也许在1983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能够找到：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李珍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殷切但不乏克制地向国内学术界报告了“美国对唐诗的研究，人力是雄厚的，藏书是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他还兴奋地提到耶鲁的欧文博士(Stephen Owen)研究唐诗非常了得。1986年，宇文所安(就是上面说的“欧文”博士)的《初唐诗》被翻译成了汉语并开始影响国内唐诗研究的方向。而在同一年，耶鲁的孙康宜(当时还不是东亚系主任，不过她那时已经是耶鲁东亚语文系研究所所长)出版了Six Dynasties Poetry(六朝诗歌)，其中文版本即《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李珍华教授提到的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摆脱了汉学(Sinology)侧重于历史、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传统。他们那一代学人已善于应用西方文学批评手段去解读中国文学。美国的高友工运用“新批评”方法研究唐诗，而法国的程抱一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唐诗，这些都可说是卓越的成就。但在宇文所安和孙康宜(目前两人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的研究中又有新异之处。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体系本身就是“自足”的，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一书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想法，这是耐人寻味的。当然，他们这种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自信不仅来源于这些年突飞猛进的研究成果，也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本身的“影响力”。以耶鲁为例，“古典文学”一向指的是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1988年后，比较文学系里的“古典”选修科目就包括了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与描写》经过了二十年才被我们以简体字出版，这是否与六朝诗歌在文学传统中的形象不佳有关？“浮华”、“绮靡”等泛泛之论往往习惯性地出现于评论六朝诗歌的文字中，而无视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谢灵运、谢朓对李白的启发，以及杜甫将庾信作为自己的异代知音这样的文学事实。“状物/描写”(description)与“表现/抒情”(expression)表面上是中国文学概念，在本书的中译本中不易看出它们的西方学术痕迹，但作者是用它们回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特别注重于“表现”问题的风气。另一方面，作者用这两种诗歌构成因素去分析六朝诗歌显得特别有效。比如，在东晋从玄言诗与哲理诗到以文学藻饰为特征的唯美风格占主流的文学氛围中，陶渊明诗歌中“抒情”成分的突然出现就显得既古怪又不合时宜，但他的“不修饰词汇”(口语化特点)、弹性结构、自传性等特征都可以在“抒情”这一背景中得到新的解读。这种解读的特征之一是，它不以古典文学的意义消费者面目出现，而是努力在解读中生产意义。在接受这种“意义之生产者的阅读方式”的过程中，传统文学批评中有一种我称之为“

## 《抒情与描写》

以传驭文”的简单化共性渐渐凸现。比如从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出发来解读他的诗歌中以“隐逸”、“不羁”为特点的美学因素。孙康宜则谨慎得多，她从不用未经证实的人品定论去统摄对文品风格研究，而是将精密的传记分析与作品年代分析进行对比，将文学史上风气的渐变与个人修辞用心进行对比，以此彰显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作者的独创勇气。比如说，陶渊明实际上曾经在政治斗争中立过奇功。公元404年，他参与了解救晋安帝的行动。晋亡后，他拒绝使用刘宋政权的年号(这是很严重的政治表态)；他的第一次辞职起因于对名门望族王凝之(王羲之之子)倨傲作风的不满。王凝之死后，他立即复职。对于著名隐士们一同隐居的邀请，他予以拒绝。孙康宜利用传统史料把那些不牢靠的传统印象拆毁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这种情况：正如宇文所安所说的，陶渊明的诗歌“充满了矛盾”。孙康宜欣赏现代批评者把陶渊明看作“以饮酒为面具掩饰深意的人”，既承认他具有高士的情操，又赞同鲁迅褒奖他在《闲情赋》中“有勇气挖掘情爱各层面”的结论。她引导读者“趋向更变幻莫测、更深入人意、更丰富、更实在的解读”。针对陶渊明诗歌的口语化特点，她这样说：“他的诗歌，给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尝试去创造平易风格的印象。”她在另外一本书中引用过艾略特《何谓经典》的一句话：“经典就是‘成熟之心灵’之表现”。她分析“抒情”与“表达”的艺术层次，其实就是在赏析那种抒情中的“心灵成熟”，一种对黑暗力量所持的生机勃勃的旷达抒情。在对其他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诗歌的考察中，他们每个人基于个性对诗歌探索所作的贡献都得到了准确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评价。在书的末尾，孙康宜先生强调，在六朝，“中国诗歌之抒情被探索到了极限”。的确，在六朝之前，中国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显得过于紧密，诗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脱离了自身发展的合理轨迹。而六朝政治动荡、贵族没落，“诗歌与朝政的分离，道德标准的打破，都表明这是一种解放：诗歌在否定自身的行动中，发现了丰富的新主题。”(宇文所安：《初唐诗》)正因如此，六朝诗人的成就加上所谓“四声八病”等形式主义的“桎梏”，在几百年后出人意料地催生了中国文学中最为夺目的唐诗。

# 《抒情与描写》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